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批判

王希亮

1995年8月15日,由日本10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讨委员会”编纂出版了一部洋洋大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以下简称《总结》),该书收入19位日本学者与政客的讲稿,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全面否定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公然美化殖民统治和天皇法西斯主义,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公正性。可以说,这部书代表了日本朝野“战争责任否定派”的战争观,又是一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集大成者。以下,按着该书构成的四个部分及部分作者的主要观点,简要剖析之。

一 中村粲的历史观

在第一部分里,分别载入了中村粲、总山孝雄、松本建一、上杉千年等4人的文章。中村粲的文章可称作是一部“重头戏”。中村氏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现为独协大学教授,其代表著作有《日本辩护论》、《为了学生的大东亚战争史》(四卷)和《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等。尤其以后一部书代表其战争观和历史观,部头很大,共600余页,载入《总结》中的这篇文章实际就是他的《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的缩写。中村粲从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支那事变切题^①,划分了日俄战争、日美对抗之始、第一次世界大战、华盛顿会议、北伐与革命外交、支那的东北与混乱、满洲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

^① “支那”一词在日本已不被使用,但是,《总结》的作者们却一口一个“支那”,其蔑视中国的顽固态度则可略见一斑,为保持原貌,在这里原文引用。

件、日美谅解案、ABCD 包围圈、御前会议、东条内阁、三国同盟等十几个小标题进行了阐述,最后对大东亚战争的性质作出结论,当然是个全面肯定的结论。

综观中村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日俄战争是解救亚洲的战争

中村称:明治时期“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俄国”,“俄国是一个非常的、具有侵略体质的国度”。接着,他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他认为中朝两国也负有“战争责任”,“因为这两个国家弱才招致俄国的侵略”,“如果支那和朝鲜能着意阻扼俄国的南下,其后亚洲的历史将会完全不同,日俄战争将不会发生,日本也不会进入满洲,满洲事变及后来的一连串纷争就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中村氏无视历史的基本事实,为明治以来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贴上“自存自卫”的标签,然后又通过一系列根本违背历史常识的假设,主观推断出日俄战争“是为了拯救亚洲的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为了自圆其说,中村氏不惜为日本的军国主义涂脂抹粉,他称:“如果没有当时的军国日本,整个亚洲当时就要崩溃”,“没有日本的近代化和富国强兵,亚洲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正因为有了军国日本,才能对俄一战,亚洲才得以解放。”

(二) “廿一条”并不“过火”

中村氏认为,日本提出“廿一条”的背景是为了确保“在满洲的权益”,这些权益是“日本依据朴茨茅斯条约以及日清(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所得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排日以及美英的介入,使这些权益得不到保证”。“当时,日本并没有要求领土权和驻兵权”,也“没有特别要求新的权益”,日本只是“为了确保日本人的生存权益”,因为“日本的国土和资源贫乏,为了日本人能在他国生活下去,在南满洲租借土地,经营工商业或农业,或者旅游、生活,此外就是延长满铁的租借期,延长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这些要求就是廿一条,实际上只有十四条,不能说是过火”。一个后起的东洋帝国,把刀架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要这抢那,旨在灭亡中国的司马昭之心,在当时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有力

抨击。时至今日，出自中村氏的嘴里却好似自由市场上的一桩小生意，轻松得如此令人难以置信。更为荒唐的是，中村竟然声称：“日本人是一个领土欲望极小的民族。”远且不论，日本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霸占大半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不知中村氏作何解释？

（三）‘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人的愿望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中村氏所持的观点同当年关东军的宣传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20年代世界各经济圈的形成以及白人世界排斥日本移民的作法，使日本“不得不关心满蒙”，把它当作日本国的“年增加百万人口的处理场所，即满蒙新天地，这是由于当时的国际情势所决定的”，所以，“满洲事变不能单纯说成是日本随意打破二十年代国际协调、行使武力的侵略”。“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无法明了满洲事变的原因”，“简单地说，满洲事变使满洲非常安定，又获得超过中国几倍的发展，连后来入满洲的李顿调查团都为之震惊”。

关于伪满洲国的成立，中村氏重拾当年关东军及“满蒙学派”的牙慧，竟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支军阀武装进了北京城后，掘了慈禧太后的坟，盗走墓中的大量珠宝，还对慈禧的遗骨进行了凌辱，于是，中村得出结论说：“可见，中国本身也没把满洲当成自己的”，“如果把满洲当成自己的(领土)则不会作出那种事情”。中村氏的“高论”自然不值一驳，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这位先生治学之草率，引证之荒唐，结论之武断实在令人捧腹。中村以“满洲非中国论”作铺垫，引出的是伪满洲国的成立在于“民意”，“满蒙人自身希望独立”，“如果没有满蒙人企盼独立的志向和意愿，单凭日本的强制力绝不可能成行”。他又举例称：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经呼吁在北京的张学良返回满洲，但是，有满洲人呈书本庄繁，要求关东军暂时留驻满洲，不要让张学良返回”。不错，日本侵占东北后，捧出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一伙汉奸为其效力，然而，如果利用汉奸们当年的表演来证明伪国出于“民意”，实在是虚弱、浅薄和乏力得很。

（四）卢沟桥事变第一枪系“中共所为”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继而倾国力、财力和军事力全面侵犯中国,其十足的侵略性质早已昭然天下,本来无须凭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来判断。然而,中村氏为了给这场侵略战争戴上‘自卫’的桂冠,竟在‘第一枪’问题上大作起文章来。他称:‘犯人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手下、以隐蔽共产党员身份进入中国军队(指第二十九军)的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他制定了同日本积极作战的计划。’中村说,其根据是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一书。^①中村称这本书中记有‘秘密共产党员张克侠进入中国第29军,任副参谋长,计划了同日本的战争,所以,同卢沟桥事变有关系’。那么,《卢沟桥事变风云篇》究竟是如何记述的呢,不妨引用如下:‘1937年4、5月间,29军研究制定了对日抗战的具体作战方案……29军参谋长张樾亭根据国民党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消极方案。29军副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不同意,另外拟定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积极方案:将29军十万大军编成几个集团军,分为天津、北平、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为总预备队集结地带,一举击败日军在华北的两万兵力,然后集中全力挺进山海关,收复关外领土。这个方案经中共北方局同意后,上报给宋哲元。宋哲元极为赞赏,命令张克侠按此方案积极准备。’(第169页)中村氏抓住这一段话,于是联想臆断起来:当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为刘少奇——张克侠是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搞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积极方案(中村文称‘同日本积极作战的计划’)——卢沟桥‘第一枪’系中共所为。他为自己有此‘更大发现’和‘重大突破’分外兴奋,自诩道:‘在日本,我的书(指《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恐怕是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中村氏的主观臆断丝毫不能改变卢沟桥事变的侵略性质。人们知道,当时的日本军队屯兵华北,频繁演习,不断寻衅滋事,兴兵侵略早已箭在弦上,为中外各界所洞明。作为中国军队当

^① 中村氏在文中称,此书是北京人民大学出版,实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更正之。

然不能坐在家里任人宰割,制定一个积极抗战方案乃是军人之天职,无可非议。况且,这一积极方案同“第一枪”根本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另外,综合中日双方以及各方面的史料也证实,策划“第一枪”的当事人乃是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其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①中村氏抓住张克侠搞的“积极抗战方案”大做文章,不过是暴露其为了翻侵略战争案而不惜任何手段罢了。

(五)“支那事变”的目的不是领土要求

中村氏认为,“支那事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绝不是为了支那的土地,更不是为了领有支那,而是为了要求蒋介石放弃容共抗日的政策”。他称,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一直等了8个月才承认这个政府,为的是希望蒋汪合作,“反共和平”。日本近卫声明(1938年12月22日)也“表明了对中国没有其他意图”,只是希望中国方面“与日本协手反共和平”。最后,中村氏结论称:“我再重复一遍,日本寄以中国所企望的是汪蒋合作,建设安定统一之支那,并同日本经济提携,这是日本的愿望之所在,除了以上再无其他,对中国领土的要求一次也没有。”日本的目的是“在于安定中国的秩序,建设一个安定的中国,与日本经济提携,继而建设一个安定的亚洲,这才是日本的意愿所在”。中村氏上述腔调,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只要翻一翻30年代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书、诏书、声明之类,就可以找到类同甚至一模一样的注脚,当然,也就不值得一驳了。

(六)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

中村认为,大东亚战争从根本上言:“是我国大陆政策与美国远东政策的不一致”,“我国大陆政策之基本是什么呢?即希望日本在满洲、特别是南满洲到北支那的特殊权益得到承认,然后,创建一个以日本、满洲、中国为轴的共存共荣之东亚,即日满支共存共

^① 见《近代中国》第42期及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中,第28—29页,东京审判刊行会,1977年。

荣的亚洲自给自足圈。”战争时期,日本官方就是用上述冠冕堂皇的宣传为自己的穷兵黩武涂脂抹粉。今天,中村氏把早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的破烂货又拣了出来,塞进自己的“大作”之中,只能给人饥不择食的感觉。更荒谬的是,中村氏竟把战争责任推给中国,推给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国家和人民。他称:“日俄战争以来,尽管日本把满洲从俄国人手中夺了回来,中国方面对此并不感谢,相反却排斥日本,而且把美英拉入排日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加入进来,排日愈发恶化”,“国共合作,容共抗日,更激发了抗日,在这种状况下,日本的大陆政策越来越难以实现,在这个极点上,大东亚战争由是爆发。”所以,大东亚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由于 ABCD 包围圈在经济上扼制日本,日本万不得已,为了摆脱它,才进行自存自卫,进入东南亚资源地区。其结果,日本确实支配了南方,但是,这个支配的结果,使东南亚全部获得了独立”。“我想问一问东南亚的人们,由白种人继续实施殖民统治好呢?还是虽然有战争牺牲但获得了独立好呢?”最后,中村结论称:“大东亚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是命运的战争,同时也是使命的战争,我认为,日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使命。”

中村氏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评价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是“自卫战争论”;二是“亚洲解放战争论”。不难看出,中村氏在从事严肃的历史课题的研究中,其史料运用、思维方式、研究手段等无不是“先入为主”的,即以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为前题,然后搜集“资料”,阐述观点,牵强附会,甚至望风捉影,主观臆断,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令人瞠目结舌了。

《总结》第一部分中,还收有总山孝雄的文章,其人曾任近卫第四联队通信中队长,到过中国南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一线作战”;战后从事牙医教学工作。他的文章先是用了大量篇幅讲述 15 世纪以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外侵略,试图阐明弱肉强食的逻辑,然后落点在大东亚战争的评价和谢罪问题上。

他认为,大东亚战争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打这场战争,日本

就会倒退到明治维新以前，比起贝利来航前的状态还要糟糕，日本除了沦为殖民地外别无他路，所以，大东亚战争不是日本人想侵略（他国）而掀起的，是被逼得毫无办法才打的，尽管力量和信心都不足，但无论如何要打下去，其结果是解放了亚洲”。总山还说：“日本是个正义的民族，日本作出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出色的国际贡献”，“日本民族以自己的存亡为赌注而战，驱动了历史车轮朝着人种平等的方向运转。”可以说，总山的上述一席话不仅仅是信口开河，他吐出的也是一部分帝国军人耿耿于怀，无时无刻不想翻案的心声。

在谢罪问题上，总山更是一个“强硬派”；他煽动自民党议员说：“欧美人侵略并没有谢罪，日本的侵略（在这里他还是用了‘侵略’二字）是为了保护和解放亚洲而战，在为了完成这场战争而进行死战之际，虽然带给亚洲同胞许多痛苦，但那是为了解放他们。白人们进行利己的侵略没有谢罪，为了反击侵略而战的日本为什么偏偏要谢罪呢！我们为了解放亚洲而死战，为什么不能把这当成自豪呢？如果卑躬屈膝地去谢罪，只能使我们的功绩消失，还要愈发激起忘恩的非难。”“由于日本的死战，人类从人种间的弱肉强食进入平等共生的时代，获取了伟大的进步，日本人不应该挺起胸膛引为自豪吗！”这位曾经荷枪实弹踏入他国进行过“一线作战”的帝国军人，根本没为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而有半点内疚，相反，他还顶着“帝国圣战”的那道“光环”，骄横和不可一世地梦呓着老军国主义分子的腔调，不仅是在为那些战争亡灵们招魂，同时，又继续把战争狂人们的血淋淋刺刀插到亚洲人民的心头上。

第一部分的第三篇文章系松本健一的《从幕末到大东亚战争》，松本健一系丽泽大学教授，从事日本近代思想、政治研究。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讲了幕府末期以来的日美关系以及日本国内各派势力围绕着贝利来航的各种反映，在此从略。

二 上杉千年的‘教育改革’主张

第四篇文章题为《历史教科书向孩子们讲授了什么》，作者上杉千年，历史教科书研究者，著有《教育基本法改正论》、《总结：教科书问题与教育裁判》、《検証·从军慰安妇》等。在这篇文章中，上杉的中心议题是主张进行第三次教育改革（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后进行了两次教育改革），首先是改正日本的《教育基本法》。为此，他曾著有《教育基本法改正论》，印发了5000册，还向岐阜、长崎、冈山三县的县议会提出“改正要望”。上杉所主张的教育改革，说穿了，不过是针对历史教学中关于侵略战争的内容，具体提出以下几点：

（一）国旗、国歌问题

人们知道，日本的国旗、国歌自明治以来一直延续使用，被奴役过的亚洲人民对日本的太阳旗和国歌记忆犹新，因为它总是同侵略、屈辱等字眼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血泪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日本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及国民对日本的国旗、国歌的延续使用不以为然，一些学校的升旗仪式，国歌齐唱等仪式也未能尽上杉等人之意。对此，他有些痛心疾首，抱怨道：“仪式混乱，大都市国歌齐唱不彻底”；“国旗、国歌应该整然地渗透到教育现场。”

（二）教科书中滥用‘侵略’用语

上杉认为，日本的教科书中，“从章、节到小项，常使用‘侵略’的字眼，有的一页可见四、五次之多，系滥用‘侵略’用语”。上杉对日本文部省“倾全力纠正左翼一面倒的历史教科书的记述”表示赞赏，认为经过文部省的努力，“使教科书几乎趋于正常化”。然而，由于日教组“插了一脚”，提出家永三郎的第一次、第二次教科书诉讼问题，才出现“教科书骚动”事件。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他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自我解释权”，他说：“本国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抑或是自卫战争？应该由自我解释权来断定”，“本国所进行的战争，不问青红皂白冠以‘侵略’，从教育观点来看让人作如何感想

呢,所以,关于‘侵略’之用语,我认为《改善意见》是适当的意见。”所谓《改善意见》是文部省在第三次教科书裁判时对家永三郎提出的意见。内容是:关于“侵略”一词,“尽可能不要使用,但是,你(指家永)如果使用了,也没有办法,作为文部省是不喜欢的”。上杉也站在文部省的立场上,讨厌使用“侵略”一词,其战争观及“教育改革”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了。

(三) 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

上杉千年对南京事件并没有研究,文中只是借用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以及陆军士官学校同窗会团体——偕行社编纂的《南京战史》等史料,就轻率地得出结论称:“很清楚,南京大屠杀是不可能出现的”,“从日支双方的兵力以及战斗的全貌来看也是再清楚不过了。”上杉既没有研究,又没有在史料挖掘上下功夫,只是跟在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身后摇旗呐喊,单就其作学问的态度,也是难以令人苟同的。

《总结》的第二部分题为《东亚战争之终结与亚洲》,收录了江藤淳、西部迈、名越二荒之助、中岛慎三等人的文章。

三 江藤淳的日本‘有条件投降论’

先让我们简要剖析一下江藤淳的文章,其题名为《围绕着所谓‘无条件投降’——被遗忘的日本外交的原点》。江藤氏首先就波茨坦公告的内容作了一翻解释。他认为,不管是英文版本,还是日文版本,其中的第十三项所规定的都是“日本国家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而不是“日本国的无条件投降”。江藤氏为什么一开头就不惜笔墨来“解释”波茨坦公告呢,其项庄舞剑,当然是为了阐明他的历史观,同时,也代表了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对“无条件投降”的耿耿于怀。江藤“解释”:日本的战败投降同德国截然不同,“日本的失败同德国的失败也完全不同”,“日本的降伏是维持国家机器下的降伏,是根据协议的降伏。而德国是国家被消灭下的降伏,是由于被征服而降伏,被征服的降伏同协议下的降伏完全不同……从降伏的法

理上言,日本不是无条件降伏,而是根据协议的降伏,日本不是被征服,而是根据国际协议降伏的。”江藤氏把日本同德国作以对比,他认为战争结束当时,“日本能够维护国家机器,舆论机构也完全能够维护其机能”,德国则不同,“(德国)国内已成战场,统治者(希特勒)自杀,军队支离破碎,指挥系统消亡”。江藤之所以反反复复强调日本同德国的“不同”,为了阐明的是,当时日本的“军人、国民战意仍然旺盛”,有关当局“最担心的是国民,即民间翼赞壮年团准备了竹枪或武器,如果杀掉登陆的美国先遣队,就出了大乱子,原子弹可能落到东京”。幸亏“御圣断”,即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才使“军队按着陛下的命令,一丝不乱地行动”,海外及国内的军队才“在国家统制下复员”。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穷途末路却要垂死挣扎的法西斯幽灵在徘徊。不错,在战争结束当时,确实有一伙不甘心放下武器的死硬派军官,丧心病狂地欲把1亿国民的生命当作赌注,叫嚷着“一亿玉碎”,准备作最后的一逞。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灭亡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凭几只螳臂挡车只能失败得更惨。江藤氏偏偏要赞赏这种“旺盛”的“战意”,以此说明日本与德国的“不同”,从而为他的“有条件投降论”作注脚。

再者,江藤死死咬定的“军队无条件投降”不等于“国家无条件投降”的谬误也是站不住脚的。据波茨坦公告中文版载,第十三项的内容为:“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很显然,波茨坦公告是对日本政府发出的敦促令,前提是“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换言之,只有日本政府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军队放下武器才成为可能,因为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受该国政府统辖的,排除军队阵前倒戈之例外,只有在战败国的无条件投降的大前提下,才有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常识。江藤氏在国家和军队这个主从关系上打算盘,演绎出他的“理论”,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否定东京审判,否定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这便是他在文章后半部分倾述的内

容。

当然,作为学者的江藤氏在评议这个问题时还是持“慎重态度”的。他对“细川讲话”自然是不赞同,却不象他人那样予以猛烈抨击,而是“平缓”之中带有揶揄。在江藤作这篇讲演时,由于日本政界的复杂多变,细川宣布辞职,由羽田孜接任。在辞去总理时,细川说:“啊,樱花谢了,我也辞去了总理。”江藤引用细川这句话后,用一种幸灾乐祸的调子道:“那也许是再好不过的了,(细川讲话)是相当欠缺思考的发言,由欠缺思考的人担当国政,莫如好好去作下野党吧!”江藤氏揶揄式的讲话立即引起与会自民党议员们一阵得意的哄笑。

接着,江藤用其他学者的话提出:“日本究竟坏在哪里?掀起一个质问国际司法裁判所的运动有什么不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进行的所有战斗行为,所有参与国每次都给于被卷入战斗行为的人们带来惨祸……那么,到底比照什么法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近百年来在国际司法裁判所引起很大议论,如果有恶的东西,那么,由谁来裁判?这是很难很难的问题,仅仅从法的理论来考虑是有难度的,还要作为道德、宗教、哲学等问题进行考虑。”江藤氏的“聪明”之处是借用别人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便是日本某些学者提出的“东京审判无法可依论”,即从国际法的角度否定东京审判的权威性,从而推翻东京审判。关于此说暂略,将在第三部分详细剖析之。

江藤摆出上述观点后,换一个角度深入阐明日本的“不坏论”。他说:“日本有四个岛,各类人种从亚洲诸地来到这里,融合之,成为今天日本人的祖先……一直讲着日语传至今,为什么只是日本人作了坏事呢?为什么只是日本人是恶人种呢?那些恶的证据又在哪里呢?凡是有责任的政治家,有头脑的学者,有言论责任的言论人(评论家),能够轻易地开口吗!不只是日本人,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韩国人也好,不论是谁,作为人而言能允许那种事情吗!为什么我们不要考虑考虑呢!”这里的所谓“轻易开口”,当然指的是“细川讲话”,这才引出上面揶揄细川的一番话来。江藤氏用颇

具鼓动性的腔调向在座的自民党议员们提出“疑问”，其实，“疑问”的背后已经明确点出江藤氏的是非观和历史观——这便是“英美同罪论”。日本有些学者认为，殖民地时代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向东方入侵，把许多国家攫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也作了许多坏事，为什么英美无罪，唯独日本有罪呢？关于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详细介绍之。

四 西部迈对东京审判的抨击

西部迈的文章题为《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围绕着细川首相的“侵略发言”》。西部迈是一家名为《发言者》杂志的主干（相当于主编），他的文章力图从政治学的角度，说明战后以来日本人历史认识的症结所在，进而把“细川讲话”规定为“思想犯罪”，把“东京审判”称作“复仇的仪式”等等。以下仅就这篇文章中西部迈的历史观作一简要介绍，并剖析之。

（一）“二次大战结束前，在世界上不存在裁判‘侵略’的道德体系和国际法”

对于“细川讲话”，西部说：“那场战争，叫大东亚也好，叫太平洋也好，是侵略战争这个说法我怎么也没能想到，听到那个发言，我冷静地思考，‘侵略’这个词并不一定是坏的意思，当然也没有别的好的意义，我对‘侵略’下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最初发动武力则称之为‘侵略’。具体来说，卢沟桥事件谁开的枪啦，珍珠湾事件被引诱而致啦^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排除这些说法，如果把最初以国家组织形式发动的武力称为‘侵略’的话，中国方面也好，太平洋方面也好，那是侵略的，可是，我并不认为‘侵略’就是坏的东西，也不需要谢罪，这是必须明确的”。“从道德上言，正如许多人认为的那

① 现在，日本一些人士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受英美的诱引、蛊惑而发生的，美国人故意露出破绽，诱使日本开战，为美国参战制造借口。对卢沟桥事件，日本一些学者也“考证”，称是中国军队首先开的第一枪。西部在这里显然是赞同这些说法。

样,亚洲已成欧洲及白人殖民帝国的侵略之的,日本的政治、经济又被 ABCD 包围圈扼制,太平洋战争首先是为了反抗这些,虽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正确),但是,基本上是正确的。”西部氏的这段话前后矛盾,令人费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侵略”并不坏,谢罪不需要,日本当然也就不负有侵略战争的责任了。为了解释这一观点,西部接下去说道:“我想说的是,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之前,既没有裁判侵略的道德责任或道德体系,也不存在一个法律体系,这是必须确认的……作为国际法裁判侵略的法律不存在。”这便是日本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东京审判无法可依说”。

事实并非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在巴黎召开一次和平预备会议,组成一个“战争开始者责任及刑罚执行委员会”,美、英、法、意及日本各出二人,其他波兰、比利时、罗马尼亚等五国各出一人,组成一个“十五人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中明确规定了四项内容:一是策划战争者之责任;二是关于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三是个人责任;四是裁判机构的组成及手续。该报告书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参加国的一致通过。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公约签字,在这份公约中,明确规定有对于战争犯罪、个人责任的制裁条款。这以后,经由华盛顿会议,海军军缩条约及九国公约签字。1928年8月,不战公约也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大国的承认。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进行侵略战争的国家要追究其战争责任,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尽管一战以来的国际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幼稚之外,二战结束后一些国际法(如《国际军事审判所条例》1945年8月8日)又临时拟定,这也是无可指责和非议的。本来,法律的原始产生,就是在犯罪的事实出现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广泛、最长久的一次世界范围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除了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有关国际公约以外,由参与反侵略战争的国家 and 民族制定惩办战争犯罪法案顺章成理,这是正义惩办邪恶的必然,也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西部氏及日本一些学者避而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法的存在,偏要吹毛求疵,又一次告诫人们日本战

败投降后,老军国主义分子不服气、不认账、不反省的阴魂未散。

(二) 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带有“复仇者的复仇感情”

西部认为,“远东军事审判——东京审判是单纯的复仇仪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里,支撑它、使它正当化的法律并不存在,没有法律的审判本来就是没道理的,我的结论就是:那是‘复仇的仪式’”。接下去,西部的口气又似乎“缓和”下来,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说它是‘复仇’,但又不想过火地说那次审判是不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复仇’这个东西古往今来就有,今后还会持续。同日本的战争牺牲者人数比,美国是微乎其微,可是,前提他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最后复仇,尽管说成是文明,或者是法治社会、法治国际,但那样简单、纯粹的法治社会是不成立的,在法律的背后,要相应地存在着同某种集团性感情相对抗的东西,这种复仇的感情和行动不可能彻底从这个世上消失,为此,战胜国把中国拉了进来,以这种形式完成了复仇,即那场审判。我不想反驳什么,即然失败了,不得不接受复仇的仪式’。‘进一步言,中国也好,朝鲜、韩国也好,无论怎么说是受到了进攻,也有相当的牺牲,即使以任何法律形式进行了战后处理,但因为遭受进攻、自己同胞被杀害的这种复仇感情,仅仅靠一次法律是不可能解决的,从今以后,他们大概还要持续若干年或几十年……这种复仇感情今后还要持续。不管怎么样,即使日本是侵略,对这种复仇的感情也不能谢罪,我们必须要把这一点看得透彻。’西部上述的一大段话解释开来,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西部认为日本接受东京审判是冤枉得很,是战胜国出于“复仇感情”的“复仇仪式”,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不得不接受战胜国压在头上的这场审判;第二,对战胜国的“复仇审判”不应该谢罪,因为中国、朝鲜、韩国的“复仇感情”还要长期持续下去,即使经过了法律审判也无济于事。在这里,我们想把中国的一句俗语送给西部先生,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场长达14年之久的罪恶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3000万人以上的巨大牺牲,其他财产、经济损失更是无可计数。然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纠缠不放,相反,在中日恢复邦交之

时,中国政府主动宣布放弃战争赔款;在民间,中国的老百姓用自己的乳汁抚养了许许多多被战争遗弃的日本孤儿……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宏和大度有目共睹,举世钦佩。至于要求日本当局战争反省和谢罪,是保证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基本前提,既不苛刻,也不过分,也是日本方面能否尊重历史,接受教训,坚持和平的试金石。

(三) 细川讲话是“思想性犯罪”

西部在这篇文章中对“细川讲话”予以猛烈地抨击。他说:“一个国家的首相、总理在公开场合谢罪,假如没有公认的道德和法律作根据,这种公开发言的谢罪,只能给世界大众带来混乱”。“我认为这很不象话……如果归纳社会上认为(细川讲话)很不象话的人们的意见,是把战争牺牲者遗族的情绪当成了下酒菜;二是一旦这样认为、拍板的话,赔赏金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引出这些问题来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细川)谢罪发言是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历史感觉的全面挑战,因此,我想说,这是思想性的犯罪”。“公开谢罪是把(日本)过去的历史丢进无止境的深坑里,将大幅度的损伤日本国民对日本国民历史的敬意……对先人们创造的历史进行分析、评价、解释,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职责,可是,对这些历史谢罪,是从基本上轻蔑历史的态度,不能不说这是‘思想性犯罪’;甚至可以说这是‘思想性的野蛮行径’。”“细川讲话”发表以后,遭到日本自民党、遗族会等一些政党、团体的强烈反对,也有些学者撰文抨击。细川在一片攻击声中不得不纠正其讲话,把“侵略战争”改称为“侵略性行为”。在众多的抨击声中,唯有西部的抨击可谓“上纲上线”到最高水平,因为,指责“细川讲话”是“思想性犯罪”、“思想性的野蛮行径”或许是绝无仅有。

西部文章的后半部分着眼于日本政治社会的评价和议论。西部认为,日本战后的现状“如同细川讲话那样,是对历史、传统、习惯的一种极大的破坏,使日本滑向历史破坏性的倾斜”。西部主张,“必须恢复国民健全的历史感觉”,而这种“历史感觉”能否得以恢复,则有赖于自民党提出的“政治改革”。西部完全站在自民党的政

治立场上,褒扬自民党的历史作用,指责社会党及其他政党的举措使冷战结束后的日本“走向思想性和文明性的混沌”,是“轻视历史的态度”;勉励“自民党诸位不要丧失斗争意志,坚持努力,状况还是可以改变的”云云,从中也可以看出西部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了。

五 名越二荒之助的幻灯解说

名越二荒之助是位战争经历者,当年曾作为帝国军人出征前线,战后一度被押往西伯利亚服役。名越是采用幻灯解说的形式力图说明“大东亚战争”是一场“解放亚洲”的战争,还采用一些出访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等国的照片、访问纪录来片面解释“亚洲的心声”,甚至强奸亚洲的民意,借用某些曾经效力过日本军政、战后依然同日本右翼势力勾搭连环的人物的话语,来抒发一个战争参与者对那场战争耿耿于怀的情结。名越的幻灯解说题为《大东亚战争与亚洲的心声》,因其整个内容尚不能称之为文章,以下仅就其包含内容及取材意向归纳成几个方面。

(一) 关于日本国歌、国旗

名越采用几组镜头,分别介绍了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国的教科书中都记载有日本的国旗、国歌,为此,他很是自豪,似乎想借此说明“亚洲的心声”是倾向日本的。然而,只要看看这些教科书中是如何介绍日本国旗、国歌的,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比如,在名越的一组镜头中,展现了日本“进驻”新加坡时,各机关商家揭起太阳旗的情景,新加坡的中学教科书收录了这张照片,并注释道:“日本自称是日出的太阳之国,中间的圆圈表示太阳,那是天皇的祖先太阳女神,即天照大神。”名越于是借题发挥,称这本教科书“很正确,如果翻译过来作为文部省的指导书就好了”。还有一组镜头,是日军占领新加坡时三呼万岁的照片,教科书对“三呼万岁”解释道:“第一个万岁是祝愿天皇长寿,第二个是相互之间祝贺繁荣,第三个是获取胜利之际的喧闹之声。”名越又感叹一番,说“日本的国语辞典都未能如此深入”。很显然,上述教科书所引用的历史照片或注释

之类,根本不能说明新加坡人民欢迎日本军队“进驻”的“心声”。名越自作多情,用外国教科书出现的“太阳旗”来诠释自己的“亚洲解放论”;恰恰暴露其历史观的虚弱和无知。如果说抒发了什么“心声”的话,正是名越对日本教科书中国旗、国歌教育的不满意“心声”。他呼吁,日本的教科书“应该讲授国旗的意义,日本所到之地,不论战时还是平时,所揭之旗即是国旗,‘日之丸’(太阳旗)在世界上是最单纯、最美的旗”。其观点与第一部分上杉千年的文章略同,以下略去。

(二) 关于英美法等国教科书对日俄战争的记载

名越用了十几组镜头介绍美国教科书中载有东乡平八郎的照片和“内容感动的日俄战争”;还记载有山县有朋、德富苏峰等人的情况;法国的教科书中载有日俄战争时日军进入奉天城的绘画,画中出现了日军统帅大山严以及儿玉源太郎、黑木等将领的形象;英国的教科书记述了东乡平八郎的T形战法,还载有俄国远洋舰队覆灭的绘画。在记述珍珠港事件时,提及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源田实的名字,(教科书)“称赞日本轰炸的准确性,同时也对珍珠港偷袭予以了批判”。名越用了十几组镜头把英美法等国的教科书搬上银幕,片断地摘录其中有关日俄战争或日本军人的记述,声称这是“日俄战争中武士道精神的开花”,实在是可笑得很。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世界许多国家的世界史教科书中都有可能记载有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依名越的逻辑,那该是“武士道精神之花”开遍全世界了。

(三) 对韩国“民族独立纪念馆”的非议

在这组镜头中,名越先是介绍了韩国“民族独立纪念馆”的外观构成,称它“充满了反日”(气氛),对纪念馆中陈列的被日本殖民主义者枪杀的韩国爱国者照片,名越解说道:“这些人是在日俄战争中爆破日本铁路的犯人,他们从事游击活动,不能不公开枪杀,这是依据战时国际法予以枪杀的。”纪念馆中还陈列着日本警察逮捕、拷问韩国人的腊人象,名越称之“不堪入目”、“相当刺激”。对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尹奉吉、李奉昌等人物的事迹,名越更不以为

然,他说:“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化之父,是日本的元勋,作为日本人来说碍难把他抹煞,我希望诸位(指韩国人)应该持有称颂日本爱国者之心,在韩国的教科书中,伊藤博文被写作‘侵略韩国的元凶’;那也可以,站在韩国的立场上来写是当然的。但如果从日本的立场看,安重根是暗杀伊藤博文的犯罪者,所以,日本的教科书应该写明安重根是犯罪者,否则的话,就不能说明日本的历史。”

(四) 对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诽谤

名越的幻灯镜头又指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首先从邓小平的题词开始介绍,然后对纪念馆正面镌刻的数字作起文章来,他说:“当时,南京的人口仅仅有 20 万人左右,当然,不会有 30 万人被杀。”接着,名越把镜头推向陈列室,在玻璃柜中现出许多尸骨。他又颇为“在行”地评论道:“诸位请看,这些骨头都是新的,支那事变攻陷南京距今已 60 年,人的尸骨埋在土里经过 60 年该是破破烂烂的,可是,展示的却是新的。于是我问:‘这不是新骨头吗?’向导回答:‘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骨头吧!如果让我们检验一下这些骨头会怎么样呢,用同位素一测试就会露馅,大屠杀纪念馆就要崩溃。”从 70 年代开始,在日本掀起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真伪的大论争。经过十几年的论战,到 80 年代末,否定论者的“虚构说”、“夸大说”等论点已经在学术上露出破绽,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这一历史事实几乎被日本学术界所公认。然而,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名越依然抱住“虚构说”不放,甚至别有用心地臆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尸骨是“新的”。我们尚不能得知名越口中的那位向导是否真的信口开河,说了那些毫不负责任的话。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 60 年前惨死在日本军人屠刀下的中国民众的遗骨和那些仍活在世上,身体各部还留有令人怵心的伤疤的活证人,以及事件当时迄今留下的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是不会因为名越轻描淡写的几组幻灯镜头而化为乌有,日本军人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 吹捧汪精卫

名越用了 7 组镜头,把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汉奸首魁汪精卫搬

上了银幕。名越称他是“不能忘却的走反共、亲日、和平路线”的人物。镜头中,出现汪精卫依仗日本,组建南京傀儡政府;汪患病住院的名古屋大学校园里的梅树(相传是汪的妻子陈璧君所栽);汪的妻子陈璧君照片及死后遗言;汪死后坟墓被掘以及被缚跪地的汪陈夫妇泥塑等镜头。汪精卫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不耻认贼作父,任侵略者驱使,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这是历史的结论。名越偏偏要亵渎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感情,吹捧汪精卫是“为了民众连自己的名誉也抛弃了”;煽动与会的自民党议员们“不应该忘记”(汪氏)。他对中国人民弹劾汪精卫,视其为民族罪人很是恼火,对战后汪墓被掘,中山陵前汪氏夫妇跪像以及陈公博被处死,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等更是忿忿不平,甚至把污水泼向中国人民,称:“中国人的固执之深,超过日本人的感性。”在这里,我们不想以牙还牙,来回敬这位至今还抱着军国主义僵尸不放的先生,因为历史是公正的,又是不容玷污的,对于汪精卫的历史评价,中国人民最有权利评说,这该是名越先生应该明白事理之处。

(六) 否认日本对亚洲的侵略

名越这组镜头里所用的标题是:“谁是亚洲的侵略者”。他先是选用了美国世界史教科书中的一张地图,是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地图标明亚洲几乎全部成为欧美的殖民地。对此,名越解说道:“数百年来,他们(指欧美)才是侵略亚洲诸国的侵略者,大东亚战争正是为了把他们驱逐出去而战,日本人不是同菲律宾人作战,而是同把菲律宾当作殖民地的美国人作战。”接着,名越把话题转到谢罪问题上,说:“现在日本国有准备作出谢罪决议的动向,这是不合道理的,如果想谢罪,比如应对荷兰说:‘贵国把印度尼西亚当作殖民地历经 350 年,请向印度尼西亚谢罪!’”。在这里,名越还借用一位印度议员的话,说什么“亚洲诸国向日本要求赔赏金,正是我们亚洲人应该向日本的献身支付感谢金”。名越把这位印度议员的话奉为“至宝”,大讲特讲,似乎这位印度议员的话就可以代表亚洲几十亿人民的“心声”了。然而,只要揭开西洋镜一看,原来这位印度议员从战前到战中一直住在日本,战后才归国,大不过是位沐

浴过天皇‘皇恩’的人物罢了。当年的溥仪、张景惠之流不也是感激零涕地吹捧过主子，嚷嚷伪满的一切‘皆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吗！

除了这位印度议员，名越在镜头中还介绍了几位亚洲的“政治家”。一位是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读过书的马来西亚人，一位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父曾为日本军政时期傀儡政权头目的菲律宾人。这些人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张目并不奇怪，当然不可能代表‘亚洲的心声’。

(七) 名越的“遗憾”

名越片面地利用几组幻灯镜头，采取以点代面、牵强附会、颠倒黑白等手法，为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冠上了使‘旧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桂冠，又抬出一些沐浴过“皇恩”的人物，来论证其“侵略有功”、‘扩张有理’的荒谬结论。最后，名越竟把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搬出来作为结束语，引用其中的一段话说：“不能不对协力于东亚解放的诸盟帮表示遗憾之意。”名越结论称：“日本不应对战胜国表示遗憾之意……日本首先表示遗憾的，应该是对那些相信我能够胜利而同日本协力的人们，日本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而失败了，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还有，由于我国的战败，那些曾与日本协力的许多人遭遇到不幸或悲惨地死去，对于这些日本的战友们，如果是个热爱道义的国民，就不应该忘记他。”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名越氏丝毫没有转变军国主义的立场，他唯一的“遗憾之处”，是深感对不起那些出卖过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日本的战友们”，这也是名越捧出汪精卫之流，为其鸣冤叫屈的原因之所在。名越氏的‘固执之深’，也可以说是“超过了日本人的感性”。

《总结》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岛慎三郎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中岛其人也是旧军人出身，曾赴中国及东南亚诸国作战。在这篇文章中，中岛单方面的摘选了印尼一些政治家、学者的评论，用他们的嘴来美化太平洋战争，美化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印尼实行的‘善政’，称赞由于日本的‘帮助’，印尼才‘获得了独立’。由

浴过天皇‘皇恩’的人物罢了。当年的溥仪、张景惠之流不也是感激零涕地吹捧过主子，嚷嚷伪满的一切‘皆赖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吗！

除了这位印度议员，名越在镜头中还介绍了几位亚洲的“政治家”。一位是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读过书的马来西亚人，一位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父曾为日本军政时期傀儡政权头目的菲律宾人。这些人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张目并不奇怪，当然不可能代表‘亚洲的心声’。

(七) 名越的“遗憾”

名越片面地利用几组幻灯镜头，采取以点代面、牵强附会、颠倒黑白等手法，为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冠上了使‘旧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桂冠，又抬出一些沐浴过“皇恩”的人物，来论证其“侵略有功”、“扩张有理”的荒谬结论。最后，名越竟把昭和天皇的《终战诏书》搬出来作为结束语，引用其中的一段话说：“不能不对协力于东亚解放的诸盟帮表示遗憾之意。”名越结论称：“日本不应对战胜国表示遗憾之意……日本首先表示遗憾的，应该是对那些相信我能够胜利而同日本协力的人们，日本没有满足他们的期待而失败了，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还有，由于我国的战败，那些曾与日本协力的许多人遭遇到不幸或悲惨地死去，对于这些日本的战友们，如果是个热爱道义的国民，就不应该忘记他。”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名越氏丝毫没有转变军国主义的立场，他唯一的“遗憾之处”，是深感对不起那些出卖过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日本的战友们”，这也是名越捧出汪精卫之流，为其鸣冤叫屈的原因之所在。名越氏的“固执之深”，也可以说是“超过了日本人的感性”。

《总结》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岛慎三郎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中岛其人也是旧军人出身，曾赴中国及东南亚诸国作战。在这篇文章中，中岛单方面的摘选了印尼一些政治家、学者的评论，用他们的嘴来美化太平洋战争，美化日本在战争期间对印尼实行的“善政”，称赞由于日本的“帮助”，印尼才“获得了独立”。由